

雄安文化底色

□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课题组



雁翎队纪念馆雕塑

资料图片

雄安新区建设的千年大计已经走过第一年。当人们把目光投向这片热土，这里向世人呈现的不仅是白洋淀优美的自然风光，更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和深厚的文化底蕴。

历史文化悠久

雄安新区涵盖雄县、安新、容城三县，古为雄州、安州之地，不同朝代因辖区有异而名称多有变更。据《雄县乡土志》记载，后周时期始设雄州，取“雄”字之意，以北慑辽国。北宋时期，这里曾是宋、辽边境。为抵御辽兵入侵，北宋政府在白洋淀沿线的雄州、霸州、信安分设三关，广为屯兵，并对白洋淀进行治理，疏浚河渠，使河通淀、淀连河，建成“塘泲防线”。相传杨家将便镇守于此，这里至今仍流传着他们的传说。1374年雄州改为雄县，名称一直沿用至今。元代时，安州在一度被废除后又复设，其原所辖辖之涿城县改名新安县。此后明清两朝，新安县与安州之建制又多有演变更迭，至1913年废州改县，安州改名为安县，次年与新安县合并为安新县。容城县之名始于汉，“汉封降王有容氏于此，置容城县”。明初，容城被废除，辖地改隶雄县。1381年，容城县复设，沿袭至今。

虽各县建制沿革历代多有更迭，但悠久的历史脉络却从未间断，这片土地上涌现了诸多志士贤人。宋元之际，有五位兼具学术造诣与风骨气节的儒生杨九万、李益公、毛文伯、焦恂儒、胡炳南，被称为“燕山五丈夫”。此五人皆籍贯容城，由宋入元后，隐居易水林尖山讲道，避而不仕，遭风所及，影响深远，曾有

“杨、李、毛、焦、胡，燕山五丈夫”之流传。

元代时，理学家、教育家刘因秉持治学为人的思想，在家乡开设学馆，传道授业，就学受教者多有成就。明嘉靖年间，谏臣杨继盛铁骨铮铮，不惧权贵，因弹劾权倾朝野的内阁首辅严嵩而遭陷害，以身赴死，留下“浩气还太虚，丹心照千古。生前未报国，留作忠魂补”的诗句，流芳后世。明末清初，理学大家孙奇逢并称三大儒。明末，魏忠贤把持朝政，左光斗、魏大中、周顺昌等以党祸被捕入狱，孙奇逢联合友人积极营救。面对魏忠贤诬陷左光斗贪赃巨款、严查其家属的险境，孙奇逢又与鹿正、新城张果中集士民献金代为缴纳，终使被害身死的左光斗等得以骨骸还乡。其义行为世人所称道，被誉为“范阳三烈士”。刘因、杨继盛、孙奇逢三人都是容城人，节操风骨和学养文德一脉相承，后人赞誉为“容城三贤”。

革命文化深厚

雄安地区古有贤人义士，风骨长存，到了现代，又孕育出浓厚的革命文化，走出了一批保家卫国的战斗英雄。

全面抗战爆发后，安新、容城等地建立了多支地方革命武装，抗击侵华日军。蜚声遐迩的白洋淀“雁翎队”便是其一，因其队员枪插雁翎，船行排成“人”形，似大雁飞翔而得名。白洋淀河道纵横、航运发达，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英勇的“雁翎队”队员就是白洋淀地区土生土长的

农民，他们充分利用了熟悉环境的优势，以打猎的长枪为武器，以芦苇为屏障，如幽灵般出没在芦苇荡中伏击日伪军，打击日军的交通运输线，支援了冀中地区的抗日斗争。他们的英雄事迹可歌可泣，至今仍在白洋淀地区流传。

革命英雄的故事为文艺创作提供了优秀的素材。1945年，作家孙犁以白洋淀人民的抗日斗争为背景，创作完成了小说《荷花淀》。孙犁的写作风格清新、朴素、柔美、细腻，在带有浓郁乡土气息的诗情画意中，歌颂了白洋淀人民乐观又不失革命浪漫主义的精神风貌。有人称其为“诗中的小说，小说中的诗”。作品发表后即在文艺界产生了很大影响，许多作家争相探索学习，并实践了他的写作技巧与风格，由此形成了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荷花淀派”，作家刘绍棠、从维熙、韩映山等都是其中代表人物。此后，又涌现了许多以白洋淀地区的革命背景和英勇事迹为主题的文艺作品。1963年上映的电影《小兵张嘎》，讲述了抗战时期白洋淀的张嘎由调皮莽撞的少年成长为八路军小侦察员的故事，后又改编成电视连续剧。小兵张嘎的形象很受观众欢迎，随着影视剧的热播，白洋淀八路军抗战的传说成为家喻户晓的英雄故事。

诞生于白洋淀地区的优秀革命文化陪伴和教育了几代人的成长。今天，当我们徜徉于雄安地区，瞻仰着雁翎队纪念馆等一系列革命遗址时，眼前不禁浮现出嘎子那调皮又不失机智、勇敢的面容，以及在白洋淀中操练的“雁翎队”队员和正准备投身抗日斗争的淀区农村女性的身影。

民间文化丰富

雄安地区的民间文化源远流长、丰富多彩。源起于宋元、盛行于明清的雄县古乐是较为典型的北乐派系的民间鼓吹乐。它是农民闲暇之余进行演奏，以供休闲娱乐的一种音乐形式。雄县古乐流传数百年，时至今日，演奏曲目仍为古曲，较为完整地保留了古乐原有的风貌。2003年，雄县古乐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此外，其他各种民间艺术形式也多有流行。据《安新县志》记载，清康熙乾隆时期，安新境内梅花调、木板大鼓、鱼鼓道情、弦子鼓等说唱艺术开始流行；嘉庆时期，安新县三台人张连魁始用竹板改唱快书，在河北永清一带活动，颇负盛名。

白洋淀的自然环境造就了其独具特色的水乡文化。白洋淀是华北地区最大的湿地，素有“华北明珠”之

称。古时称“掘鲤淀”，西晋左思在《魏都赋》中描述其“掘鲤之淀，盖节之渊”。清康熙皇帝巡游至此，感叹其美景而作诗云：“遥看白洋水，帆开远树丛。流平波不动，翠色满湖中。”得天独厚的水资源条件，使白洋淀素有“一淀水一淀银，一寸芦苇一寸金”之美誉。淀区人们利用芦苇编织的炕席、苦垫席、围席、包装席等苇席，颇受人们青睐。正如孙犁在《荷花淀》中所描述的，“六月里，淀水涨满，有无数的船只，运输银白雪亮的席子出口，不久，各地的城市村庄，就全有了花纹又密、又精致的席子用了。大家争着买：‘好席子，白洋淀席！’”近些年来，一些民间艺人独具匠心，创作了苇编画，利用芦苇编织出精美绝伦的花鸟鱼虫、人文景观等工艺品，彰显了水乡特色风情。2009年，白洋淀芦苇画被列入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白洋淀的水网构筑了村落繁衍生息的生态环境，村民在生产生活中创作了许多诗歌作品来歌颂幸福生活，表达美好愿景，当地涌现出了一批渔民诗人。上世纪50年代初，王家寨李庄子李永鸿就开始创作大量民歌，1962年出版了《白洋淀渔歌》，可谓是淀区民歌的典型之作。

古往今来，雄安地区的历史文化在延续与发展创新中形成了独特的地域文化符号，显示出蓬勃生机和强大活力。这种历史文化传统在承载当地人的文化理念和精神追求的同时，也为雄安新区的建设与发展提供了深厚的基础和强大的推动力。

(执笔人：郑清波 赵雅鑫 吕文利)

文化只眼

让博物馆

“连接”大众生活

□陈钟昊

今年春节，笔者一位居住在北方的朋友携家人南下度假。他们选择的不是火爆的海岛游，而是去湖南长沙，专门花上两天时间，在新落成的湖南省博物馆观看“春秋战国文物大展”。近两年，越来越多的人把逛博物馆当作休闲旅游的必选项目。不久前的“五一”小长假，朋友圈里也能看到不少人晒古画、古瓷器等文物照片，定位是在某某博物馆或美术馆。

这股“文博热”是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的结果。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国家文博事业取得了很大进步，考古工作屡创新成就，一大批新的文博机构相继建立起来。与之相对应的是人们对文化生活的追求和品位也不断提高。为了增强公共文化机构的服务能力、满足公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2011年，《关于推进全国美术馆、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站)免费开放工作的意见》出台。这几年，许多博物馆也加入了免费开放的阵营，张开双臂迎接更多的观众。



仿古代工艺的博物馆文创产品 网络图片

如今，全国注册登记的博物馆将近5000座，不仅北上广这样的大城市拥有大量综合性、专业性的博物馆，许多中小城市也建立了展现当地历史文化的文博院馆。但在文博机构数量大增的同时，也存在资源分布不均、水平良莠不齐的问题。笔者观察到，有的博物馆“重建轻运”，展品久不更新，布展方式也老套陈旧；有的博物馆只在特殊节庆日开放，平时大门紧闭，与公众隔绝开来。

显然，要使博物馆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公共文化空间，满足大众的文化需求，还有大文章可做。一方面，文博机构要增强服务意识，改变“形式主义”作风，切实提高馆藏质量。另一方面，要多多思考如何贴近大众，让那些承载中华传统文化的藏品与现代生活相连，引导人们改变以往走马观花、不明就里的观展体验。

笔者在法国巴黎时，发现当地不少地铁站台两侧展示着卢浮宫、奥赛博物馆藏品的复制品，乘客一下车便能瞥见埃及法老石像、断臂维纳斯、巴尔扎克塑像等。在韩国仁川国际机场，分布着多个“迷你博物馆”，旅客可以在观赏文物、拓印字画中度过候机时间。这类馆外陈列形式，将博物馆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让公众感觉“博物馆就在身边”。

事实上，国内一些博物馆在贴近大众上已经做出了很好的探索和实践。以故宫博物院为代表的一批博物馆，积极运用新媒体、新手段，推出大量活泼有趣的文创产品，成为备受追捧的“网红”；中国古动物馆、南京博物院等打造“博物馆奇妙夜”活动，更好地满足城市居民的夜间文化需求；多家博物馆上线了数字博物馆、VR展览，让人们足不出户就能欣赏到珍贵文物。

今年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是“超级连接的博物馆：新方法、新公众”。“连接”这个词，已成为当代博物馆在社会生活中所应具有的重要功能。互联网时代，博物馆与公众的连接，可以有許多新方法、新形式、新场景。期待越来越多的博物馆创新思路与手段，更好地连接、融入大众生活，为人们带来精彩、多样的文化体验。

故宫举办明代瓷器展

5月18日，“明代正统、景泰、天顺御窑瓷器展”在故宫延禧宫东配殿开幕。这是故宫博物院与景德镇联合举办的又一个大型专题瓷器展，也是国内外首次举办以明代正统、景泰、天顺三朝御窑瓷器为主题的展览。展览将持续至2018年6月17日。

该展览共展出215件(组)瓷器，其中景德镇御窑遗址出土的瓷器修复品共计138件(组)，有100件(组)2014年出土的瓷器为首次公开展出，旨在将最新考古成果展示给公众。

展览中有很多展品使人耳目一新。如：一组青花云龙纹大缸残片，修复后龙缸口径70多厘米，高80多厘米，形体之大，在明代绝无仅有。再如：2014年景德镇明清御窑遗址出土的6件青花大花盆，外壁绘有云龙纹、海兽、麒麟等，体型硕大，颇有气势，即使在明代御窑瓷器烧造取得最高成就的永乐、宣德时期也未见有类似作品。

(邹雅婷 文/图)

家风家训

寿州孙氏：醇良世泽、敬慎家风

□杨艳萍

孙家鼐(1827—1909年)，字燮臣，安徽寿州(今寿县)人。其于咸丰年间高中状元，后被誉为“维新帝师”，历任工、刑、户、礼、吏五部尚书，累迁体仁阁大学士、文渊阁大学士和武英殿大学士，是中国古代最后一位谥号“文正”的晚清重臣。尤为可贵的是，1898年，他以吏部尚书兼首任管学大臣，创办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开启近代中国高等教育变革之先。此后，寿州孙氏家族人才辈出，在政、商、文化等诸多领域颇有建树，这与其家风家训密切相关。

崇尚尚教、重视读书。明末清初以来，孙氏先祖倡修学宫、文庙及设义学，热心赞助教育事业，累见于《寿州志》。至孙家鼐之父孙崇祖，乃为池州教谕，治家极严，教子有方，其书房里有亲自撰写的一幅对联：“光阴迅速，纵终日读书习字能得几多，恐至老无闻，趁此时埋头用功；世事艰难，即寻常吃饭穿衣谈何容易，惟将勤补拙，免他年仰面求人。”孙父去世后，其母林氏也以严厉的家规约束和激励孩子们发奋读书，成就了孙氏兄弟五人“一门三进士，五子四登科”的佳话。正是因为家庭氛围的熏陶，孙家鼐酷爱读书，自述“夜深灯火书有味，晨湛墨花字生香”，屡任学政主持乡试、会试，正己洁操，颇得好评。至戊戌维新时期，孙家鼐锐意于兴学育才，不辞劳苦，突破重重阻挠和反对，力促京师大学堂正式开学，成为戊

戌新政幸存下来的唯一硕果，而他自己却于次年被迫“因病请假”。之后，他捐资创办寿州公学，带动子侄在家乡开办新式学堂，使寿州成为近代教育较发达地区。

敦行实学、倡办实业。终其一生，孙家鼐不尚高谈阔论，始终务实力行，提倡“为政之道，不在徒托空言，而在



寿州孙氏宗祠

力行实政”。他出身状元，位高权重，却不固步自封，积极引介新知，讲求实用之学，提出“盖学问乃天下万世之公理，必不可以一家之学而范围天下”，主持译编《续西学大成》16册，广泛传播西方现代科技知识，“所重在裕民生、通

民隐，提倡采西法以兴实业”。孙家鼐与马吉森合股在河南安阳创办广益纱厂，为家族由仕宦转向实业做出示范，带动孙氏家族在近代实业界大放异彩；其侄孙孙多鑫、孙多森兄弟创办了近代中国最早的机制面粉企业——阜丰机器面粉有限公司，又先后北上与周学熙等参与投资和经营启新洋灰公司、北京自来水

厂、开隆矿务局、滦州煤矿等，共同兴办了中国银行、通惠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等一系列新兴实业，后独立开设中孚商业银行，构建起以面粉、运输、地产、金融为主的通孚丰实业集团；并参与发起近代中国有重要影响的经济组织和活

动，如筹建上海商务总会、上海商学会和上海银行公会等。孙氏家族成员还作为代表出席了第二十届国际劳工大会，参加中美白银协定谈判等，为实业救国做出了贡献。

提倡革新、严格家规。在晚清激荡的变革中，孙家鼐跻身社会进步潮流，讲求新政、实心任事，倡导并推行渐进式变革。戊戌维新时期，他以光绪帝师之位，“持变法之议最早”，请求颁发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由部院卿寺堂司各官逐条签注，支持改《时务报》为官报等，为推动变法进行思想发动和舆论营造；至清末预备仿行宪政，又奉命核定《资政院章程》，改革中央和地方官制，建议施行吏治改革等。同时，他生平低调内敛、操守廉洁，日常闭门斋居、远避权势，为人无疾言遽色，器量宽广，曾保举弹劾过自己的刘廷琛，被称为“所有中国官员中最有教养、最具绅士风度的人之一”，并严格家规家训，严禁孙氏族人胡作非为，流传下来的《孙氏家规》，要求子孙“居家宜戒奢侈，崇勤俭，或耕或读，务正业，以培根本……居心要存仁厚……族中子弟有聪慧俊者，宜敦书读书以期上达，不得问外事交接官府。”其后代谨记“克俭养廉尊祖训，守勤茹苦效前人”，绵延昌盛三百余年。

以孙家鼐为代表的孙氏家族，积学力行、敦品砺德，后辈中人才济济，其家风家训值得世人学习借鉴。



安新县民间艺人杨丙军芦苇画